

古代西域交通与 法顯印度巡禮

賀昌群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D18

D18
(W) 1

0076470

古代西域交通与 法顯印度巡禮

賀昌群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6470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漢

目 錄

序.....	1
一 古代中國与西域的商業交通和文化交流.....	1
二 西域地理环境与古代交通路綫.....	7
三 漢晉間佛教东傳的情况.....	14
四 法顯前后西行求法的人.....	21
五 法顯时代中國僧徒西行求法的动机.....	25
六 法顯从長安出發西渡流沙.....	33
七 于闐觀行像仪式后过帕米尔高原.....	40
八 北·西印度的旅行.....	46
九 中·东印度巡訪佛迹.....	53
十 南海归航.....	65

附：法顯西行路綫圖（插正文前）

本書譯名对照簡表	75
----------------	----

序

一千五百多年前，人類的地理知識和對自然環境的科學認識還很幼稚的時代，法顯以六十五歲的年齡，和他的同志（同志，是“法顯傳”的原文，亦見于僧傳）十人，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諸國，穿行沙漠地帶，越帕米爾高原，周游北·西印度、中·東印度，參禮佛迹，下南印度，經錫蘭島、蘇門答臘，繞行南海、東海，到山東半島的牢山（勞山）登陸，前後十四年，才展轉歸建康（南京）。同行的人，中途或轉退，或死亡，或留住，只剩下法顯一人，排除萬難，勇毅堅定，最後回到本國，他已經是七十九歲的高齡了。漢、晉間中國僧徒西行求法的，足跡所至，最遠不出北印度，法顯是到中印度的第一人。從中印度再南下至現在的加爾各答（多摩梨帝國）地方，航行至錫蘭島（師子國），這一路漫長的海陸旅行，我們可以想像，在法顯當時是一個多么艱巨的社會實踐。

法顯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四一四年），寫成他的旅行記錄，隨後應別人之請，又增補一些，即現在流傳的“法顯傳”，又稱“佛國記”，又稱“歷遊天竺記傳”，總計九千五百多字，是一部完整的記錄，也是古代記錄中亞、印度、南海的地理、風俗、歷史的第一部最原始的書，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兩部

后先媲美的偉大旅行撰述。从法顯到玄奘的二百五十年間，很多渡天僧侶都寫得有游記，如与法顯同行的寶雲及同时的曇景等僧，傳說他們都有游記，可惜現在佚亡了，又如鄺道元“水經注”引道安的“西域志”以及“道宣釋迦方志”中所引的“西域地志”、“旅行記”等書，不在少數。在總結以往对于西域史地知識的基礎上，玄奘西域記就進一步比較法顯傳的內容更丰富了。這兩部旅行記，使我們明了漢唐間東西商業和文化交通的几条主要路綫。法顯傳中提供了很多可寶貴的資料，如法顯當時所見阿育王建立的石柱，石柱上所刻的勅文和雕刻藝術，都是对阿育王时代極珍貴的研究資料；又如迦膩色迦王弘通所謂北方佛教，在北印度留下了很多佛教遺迹，法顯當時所見还保存完好；法顯执行“安居”是很嚴格的，安居的月日，可以和“西域記”所言，一起研究当时中印曆法的異同；法顯对于大小乘佛教的态度，也是值得注意的；法顯所記西域、印度、南洋的地名与唐、宋以后記錄的歷史关系，亦宜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顯傳”可以补充一些印度笈多王朝的歷史，特别是可以帮助我们多少了解当时中亞、印度許多國度的社会性質。

“法顯傳”歷來都編入“大藏經”中，明胡震亨以后才采入叢書，但各本改竄、訛譌、脫漏之处甚多。近人日本足利喜六依据北宋版东禪寺本，而以北宋版开元寺本、石山寺寫本、南宋版思溪本、南禪寺寫本、明“秘冊彙函”本、高麗版新本等六种版本加以校勘、解釋、說明，再引据佛典、史傳加以考証，考証虽簡略，校勘却很有用，无论如何是有功于“法顯傳”的。足利喜六对于漢唐尺度、里程的計算非常細致，似乎已超过前人如

伽林罕等，但其病恐怕亦正失之于細致。其書原名“考証法顯傳”，后来再版刪去“考証”二字，增訂“后編”七篇，編制較初版為優。這本小書中關於法顯往還印度的年歲，法顯歷游西域、印度的行程分段，以及附圖等，是採用足利一書的。

十九世紀以來，隨着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遠東、中東、近東各方面迅速進展，古代東西交通史的研究在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地理各方面的研究基礎上亦迅速發達起來。於是法顯、玄奘、宋雲、惠生等的行記，先後被翻譯成歐西文字，或加以注解、考釋，如古代希臘、波斯、阿拉伯的撰述一樣，被提出成為東西交通史研究的頭等原始資料了。“法顯傳”（“佛國記”）的翻譯，有理雅各、翟理斯、比爾、納繆沙諸人。這本小冊子也採用了納繆沙、克拉卜羅斯、蘭德塞諸人的考証，這些考証已收入于一部叫做“Laidlay's Fa Hian”的書中，這部書一八四八年在加爾各答出版。此外，伽林罕的“印度古代地理”也是很有用的參考書。日本方面，堀謙德、羽溪了諦、松本文三郎、小野玄妙諸人的撰述，如果想進一步研究“法顯傳”，也是應當參考的。國內岑仲勉先生的“佛遊天竺記考釋”，對於西人、日人的研究多所訂補，亦是用力之作，但他採用僧祐“出三藏記集錄”的“佛遊天竺記”作為“法顯傳”的書名是不妥的，那是另外一部書，向達先生在抗戰前“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六十八期介紹岑書時已論之，今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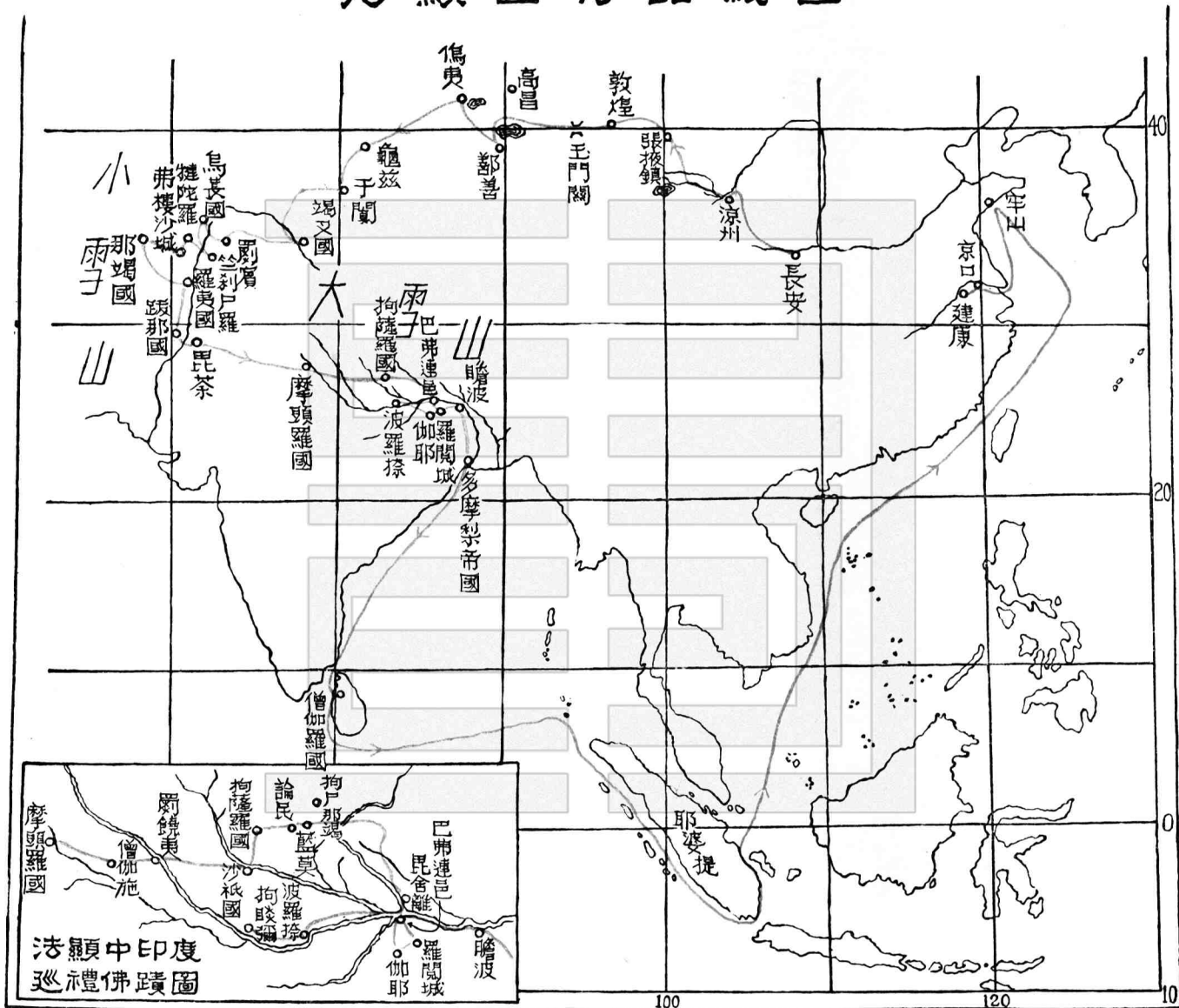
這小冊子原想把它寫成一本通俗讀物，作為中、印友好文化交流的獻禮，但寫通俗書是不容易的事，特別是一大堆外國的人名、地名、國名，最容易使人疲倦。這小冊子既不能深入，

又不能淺出，只能算一種介紹文字，也是很周詳的，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賀昌羣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

法顯西行路線圖



一 古代中國与西域的商業 交通和文化交流

“西域”这个名詞，最初見于前漢，但当时所謂西域的範圍是很模糊的，大概指中國本土西部的關門——玉門、陽關以西至葱嶺（帕米爾）之間，即今新疆一帶，称为西域。以后便随着各时代商業交通和地理知識的發展，西域的廣袤亦逐漸擴大，包括今撒馬爾罕、中央亞細亞、小亞細亞、以至于地中海东岸古羅馬屬地和印度全部，通称为西域。这些地方古代曾为無數的小國——部落部族所盤据，据“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所載，僅現今新疆境內，当初有三十六國，后来有五十余國。歷世以來，已經几多的興亡盛衰。漢晉間这些地方商業興盛，宗教随着商業的發達而傳布着。当时勢力最大的宗教是佛教，帕米爾以西，以大月氏（覩貨羅）、安息、康居、粟特、罽賓（迦濕弥羅）諸國为大；帕米爾以东，以于闐（和闐）、龜茲（庫車）、疏勒（喀什噶爾）、高昌（吐魯番）諸國为大，都是西域佛教的中心地。南北朝以前，这些地方的佛教，实为印度佛教流傳入中國的媒介，而且，当时來中國的傳教僧、譯經僧，大抵都是上述諸國的沙門或优婆塞（居士）。佛教是随着商

業而東來的，中國和西方的商業交通，秦漢以前久已存在了。中國輸往西方的商品，主要是蠶絲，蠶絲的制造和使用，原是中國古代的發明。印度最古的摩奴法典和“摩訶婆羅多”大史詩已有了支那（China）的名称，古代印度佛教徒也称中國为支那。西漢初，匈奴还称中國人为秦人，匈奴在秦漢之际，是北方縱橫歐亞二洲的一个最強的游牧部族，它帶動了東方和西方的商業和文化的交流。秦字的音傳到西方轉为 Sin 同 Thin，又轉为 Sinae 同 Thinae，与 China（支那）都是一声之轉。希臘人托尔米的“地理志”中記有秦尼國（Sinae）与賽里斯國（Serice）为鄰，据近时考証，都是古代羅馬人称中國的名称，賽里斯的意义为蠶絲地，大約指今新疆一帶，秦尼則指中國本土而言。

近几十年來，考古學上的發現，証明秦漢間中國与西方的关系，不僅是蠶絲商品的貿易，而且有廣泛的文化交流。比如，在东欧和高加索一帶發現的斯基泰文物，对于戰國、秦、漢之間銅器的花紋和体制，就有很顯著的影响。斯基泰是公元前三世紀和二世紀在裏海北面一帶的一个殺伐最強的部族，但这个部族的滅亡也很快，只有希臘古書中提到，別的國家的古史都沒有記載。近年苏联考古學者的發現，証明了斯基泰和斯基泰型的文化，牽涉的区域非常遼闊，在歐亞草原一帶流傳甚廣。斯基泰文物的特点是它的藝術遺物的設計全是动物紋样，十分有力、生动，在我國从戰國到漢代的銅器花紋和制作，都受到这种动物紋样的影响。这种銅器，近人称为“秦銅器”，其体制輕倩流麗，不及周代銅器的凝重，有些銅器上的繁复的狩獵

紋，是这类“秦銅器”的特征。苏联考古学者在斯基泰遺物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很有成績，如格魯荷夫（А. Глухов）、吉謝列夫（С. Киселев）、耶芙秋荷娃（Л. Евтюхова）諸人的著作，解决了斯基泰文化研究的許多問題。

一九二五年俄國旅行家柯茲洛夫探險隊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山麓發掘十个古墓，也証明了北匈奴的文化淵源与斯基泰型文化有密切关系。內中有許多副葬品，如朱漆的耳杯、盤等，都是夾紵的，其上所繪飛禽怪獸，車馬、乘輿，与近时朝鮮乐浪出土的漢代漆器和漢画像石的風格完全一致，漆器有西漢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二年）蜀郡西工等六十九字銘文，又有王莽居攝三年（公元前八年）的銘文。另外还有些花紋精致的絲織品，和富于希臘圖案的挂氈等，与英人斯坦因一九一四年在新疆柴达木盆地發現的古樓蘭遺址的漢代氈毯圖案極相似。这些，都有力地說明，西方的商業和文物的东漸，在秦漢之际，早已存在了。

同时，漢代文物西傳的亦不少，近时在西伯利亞叶尼塞州出土的一面白銅的日光鏡，緣边有弧形銘文。“見日之光乎，君令長毋相忘”十一字，充分顯示着漢式鏡的特征，帝俄时代藏托姆斯克博物館。莫斯科歷史博物館亦藏有西伯利亞出土的日光鏡十数面。其次，高加索亦有漢鏡出土，即有名的“漢內行花紋鉛華鏡”，其銘文为“涑（練）治鉛華清而明，以之为銅宜文章，延年益寿去不羊，与天毋亟宜日月之光，千秋万歲，長乐未央，青(?)口”等四十字，藏烏拉底加夫加斯博物館。其次，高加索和南俄罗斯都有作为劍柄上护手之用的漢代玉璫出土。

這些遺物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館及巴黎桑察爾曼考古博物館。

漢武帝時代，張騫出使西域，從公元前一三九年出發，到公元前一二六年歸朝，居留外國十三年。這件事有人比之于同新大陸的發見一樣重大，就是說，張騫在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的外交方面，雖未得成功，但在政治上、商業上、文化上所發生的影響卻異常重大。

張騫親身經歷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諸國，間接聽到關於身毒（印度）及安息、條支、烏孫、奄蔡四五个古代中央亞細亞國家的事情。“史記”“大宛傳”的前半部，即記錄張騫的報告，“漢書”“西域傳”則是根據班超之子班勇的報告。自張騫“鑿空”（把原來不相通的地方疏通了）以後，西域的物產隨着商路輸入中國的很多，“漢書”“西域傳”“贊”說：“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近時史家考証，如葡萄、石榴、紅藍、胡豆、胡瓜、苜蓿、胡葵、胡桃、胡麻、胡葱等，許多植物都是張騫通西域後陸續傳到漢土的。

一九〇七年英帝國主義分子斯坦因曾在今甘肅敦煌古長城烽燧廢墟發現兩件東漢初年的絲織物，其一件末端記有：

任城國亢父（今山東濟寧）織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

又一件是西漢末年的絲織品，已被剪斷，邊緣尚完整，寬約十九吋半，末端記有古代印度波羅謎文的度量名，這是兩件最生動的實例。亢父織的長度寬度，正與那件記波羅謎文的度量相當，都是往西方輸出的物產。東漢貴戚豪門的大官僚梁冀曾派遣他的賓客遠出塞外，交通外國，遍求奇珍異寶。有“西域賈

胡”（西域方面來經商的胡人），在梁冀養兔的園子里誤殺一兔，相連死者十余人。后漢的西域副校尉李恂，在西域任職內，西域諸國官吏和經商的胡人，屢次將奴婢、大宛馬、金銀等贈送給他，他都一概不受。這件事說明這些奴婢、金銀、大宛馬是可以對中國本土貿易的。那麼，當時西域商胡往來於洛陽、長安的必定不少。這裡應當略為解釋一下“胡”字在兩漢時代的意義。“胡”字在西漢文獻中大多專指匈奴而言，東漢便泛指玉門、陽關以西乃至蔥嶺以外的外國人，通稱為胡人。胡是多鬚的意思。

東漢的海上貿易已相當發達，由日南（越南）徼外以通天竺（印度）、大秦（東羅馬），據“后漢書”“西南夷傳”所記，始於安帝永寧、桓帝延熹間（一二〇——一六六），這是正式著錄於正史的。三國時代，孫吳曾派中郎康泰、從事朱應出使扶南（柬埔寨），“梁書”“諸夷傳”序說他們經過百數十國，康泰著有“外國傳”（亦稱“吳時外國傳”，或“康氏外國傳”），朱應著有“扶南傳”（亦稱“扶南土俗志”、“扶南異物志”）。二書今已不傳，有些古書還稱引它，如“史記”“大宛傳注”、“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這些海上交通的情況，和法顯從印度、師子國（錫蘭島）歸航時都有關係，他坐的商船是一只可容二百多人的大船；宋元嘉六年（四二九）有外國船主難提曾載師子國（錫蘭）比丘尼來建業（南京），元嘉十年（四三三年）難提再來中國時，復載師子國比丘尼鉢沙羅等十一人；又迦濕彌羅國沙門求那跋摩由師子國至閩婆（爪哇），宣揚佛化，旋應宋文帝之招，亦乘難提的商船來

中國。由此可知兩晉南北朝時，外國商船往返於中國，其數之多，可以概見。

魏晉南北朝時代，長江、黃河間的廣大區域，雖然遭到戰爭的巨大破壞，但南北的商業和海上與中亞人民之間的交通還是頻繁的。“隋書”“經籍志”載，當時記海內外山川地理的著述有一百三十九種，其中如“交州以南外國傳”、“游行外國傳”、“歷國傳”、“外國傳”、“諸蕃風俗記”、“北荒風俗記”、“世界記”、“西域道里記”、“諸蕃國記”等書，今雖不傳，但這些新的地理知識和記載的出現，正反映著魏晉南北朝海內外商業交通的發展。

法顯和漢晉間往來於西域與中國的佛教徒，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或東來傳教，或西行取經。

二 西域地理环境与古代交通路綫

今天新疆一帶，正在大規模進行社会主义建設，我們有信心利用科学逐漸改造這一帶地方的自然环境。但在中古时代，西北的气候和地理給与旅行者种种的天然障碍是不可言喻的。沙漠地帶的气候，晝夜之間轉變異常剧烈，日間酷暑难当，夜間虽拥重裘尚不能御寒，縱在七八月間，夜間溫度也会降到零度以下（当然，各地因地理的差異而有不同）。在这样張縮剧烈的气候中，沙漠地質便逐漸分裂成細碎的沙粒，經風吹散，那里遂成不毛之地，生物亦难生存了。有些人以为沙漠無垠，是很單調的曠野，其实不然，沙漠中有許多地方是流沙積成的起伏不定的坡陀，沙面有浪紋，如海中的波浪一般，昔人所以称为瀚海，也有犖确不毛的大山。沙漠又与戈壁有別，戈壁是滿洲語，亦沙漠之意，可是实际戈壁是碎石鋪陈的一片原野，地質上所受气候的影响不及沙漠的剧烈，換句話說，戈壁就是未成熟的沙漠。沙漠地帶雨量極少，行旅往來，都須自行裝載水料，因沙漠中多鹽水，不能飲。唐朝玄奘法師赴印度时，从玉門西北向伊吾（哈密）進發，要穿过八百里的莫賀延沙漠，取北道而行，行百余里，已入“热沙漠”境地，四顧茫茫，渺無边际，他迷路了，口又奇渴，將盛水皮囊取下來，正欲飲时，

不幸一失手把一袋水料傾翻，可憐“千里之資，一朝斯罄”，此時生死兩難，人馬俱絕，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可見沙漠旅行，水料的重要等於生命。

古代西北旅行，乃指今新疆全部，這帶地方，北邊是天山，南邊是崑崙山，東邊是南山（南山即崑崙山的續脈），西極于帕米爾（蔥嶺），這麼一個廣大的幅員，然而，在一般的地圖上，只有稀疏的幾個地名，其餘都是空白，又誰知這些空白中當年在古代中西交通上曾占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光輝的歷史呢。

帕米爾高原是斷橫東西的天然屏障，連峰際天，山勢迤邐東走，西面為烏澹河的源流，東面為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頂上冰雪弥漫。據說，帕米爾高原雖寒，但像穆斯塔格阿塔那樣險峻的山嶺並不多，如今尚有遊牧的吉爾吉斯人在拔海一萬一千至三千呎的高寒之地，穹廬為室，終年生活於其間。

帕米爾高原在古代是東西交通的經行地，古代烏澹河流域與塔里木河流域的商業、文化的交流，都以此為必經之路，西方古地理學者稱為“大絲路”，古代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國家如大夏、康居以及受印度佛教文化影響的伊蘭族諸國，往來都先得取道于此，然後才入現在的新疆而至中國本土。因地勢的關係，又分南北兩道。南道自巴達克山越瓦罕山谷東行，取道瓦戛爾或小帕米爾而至穆斯塔格阿塔南的薩雷庫（斯坦因證明此地是“大唐西域記”的竭盤陀國，現在還可住人）。再經過許多深山幽谷，度拔達山（凌山），越過橫亘南北的山嶺，抵塔里木河的西端，再東行則為喀什噶爾（古疏勒）及葉爾羌

（古莎車）的綠洲地帶。玄奘法師由印度歸國的途程，便取此道。十三世紀曾在元世祖那里做過官的意大利人馬哥孛羅來中國時，亦取此道。

在商業方面，則北道更為重要。北道起自大夏中部今巴爾克地方，溯吉奇爾蘇河經阿賴谷，越伊爾基斯坦，沿喀什噶爾河的主要源頭而至喀什噶爾。據近人研究，此路確為公元前第二世紀末即漢武帝時古商隊由中國販絲至烏澹河流域及大夏諸地的大道。其後千餘年間，中國和印度及近東文化的交流，都以此為干綫。

由帕米爾高原南北路東行，便到塔里木河盆地的西部，因為中間有塔克刺麻干沙漠，便天然的亦循帕米爾的路綫分為南北兩路。盆地之南為崗巒重疊的崑崙山脈，西起帕米爾，東分為數重干脈如喀喇崑崙山等，山南諸水，多注于印度河。葉爾羌河及其支流皆出于崑崙山中，亦為塔里木河的主要源頭。再東便是于闐古史上有名的哈拉哈什河及玉龍哈什河，發源崑崙山，北灌和闐綠洲。和闐以東便是于闐及車爾成（又譯卡牆，古稱且末）二河，亦發源于崑崙山。崑崙山脈最北的一支，接近塔里木河入羅布淖爾（我國史書稱蒲昌海，亦稱鹽澤，因其地為鹽質地層的風化土壤）之南，山勢迤邐東延，逐漸低坦。此處及碣羌一帶為塔里木盆地的鄯善即古樓蘭地方，因受西藏來的風候影響，故氣候較潤澤，唐宋時代吐蕃（西藏）族侵入敦煌各地作亂，便是打從這裡來的。

羅布淖爾古海遺床以東，地漸低下，為崑崙余脈的南山，有疏勒河，盛夏時流注安西、敦煌諸地。自此以東，才入太平洋